



苏修“发达的社会主义” 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陈 华 山

六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勃列日涅夫之流大肆吹嘘：“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是充分发达的、技术装备良好的城乡经济体系”。他们还胡说什么：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信口雌黄，真是无耻之尤！

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戳穿了，不过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苏修叛徒集团大言不惭地说：“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他们领导下实现的“极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的主要成果”。那么，我们只要剖析一下他们的“社会经济改革”，就不难看出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真相了。所谓“社会经济改革”，就是推行以“利润挂帅”、“经济刺激”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新经济体制”是苏修在生产关系各方面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军事化就是不顾人民死活，“要大炮不要黄油”，把国民经济绑在新沙皇的侵略战车上。这种“改革”越“深刻”，苏联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被瓦解得越彻底，列宁、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就越被破坏得无影无踪，也就使苏联完全蜕化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为什么说苏修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呢？

首先，从所有制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所有制的性质，不是看它的形式，而是看它的实际内容，看国家政权的性质，看生产资料归哪个阶级所有，用来为哪个阶级服务。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把原来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现在，苏修厚着脸皮硬说它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过是“资产者为了私利而作出的捏造”。这恰好暴露了他们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

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却是为了掠夺最大限度的利润。苏修的“新体制”，就是以“利润挂帅”为核心的“体制”。苏修叛徒们也直认不讳：利润是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苏联企业活动的法律”，是“评价企业经营活动的基础”。十分清楚，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已成为苏修生产的唯一目的。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时指出：“生产剩余价值，赚钱发财，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今天的苏修经济完全受这一绝对规律支配

了，这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气味呢？

为了追逐最大限度利润，苏修大大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和独立性，简化计划指标，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由原来 80 多项缩减为 9 项，其中产品销售总额、利润总额和赢利率是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综合指标”。这种所谓“国家计划”，不过是规定企业卖多少钱（产品销售总额）、赚多少钱（利润总额）和交多少钱（基金付费等）而已，完全是苏修一小撮大资产阶级“有计划”地控制、督促和刺激企业榨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工具。各企业头子为了多得利润，多捞奖金，你争我夺，不择手段，从而澈底瓦解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恶性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重要表现之一。

苏修从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出发，大搞“经济刺激”，使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变为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化变质的又一重要表现。所谓“经济刺激”，就是用增加利润分成的办法，以奖金来刺激企业“为提高赢利而斗争”。企业赚钱越多，“经济刺激基金”越多，可分配的奖金也就越多。同时，改变了基建投资的办法，除五年以上才能回收基建投资成本的新建企业外，其他新建、改造和扩建企业的基建投资，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均靠银行贷款解决，并实行基金付费制，规定每个企业必须根据占用的生产基金（包括固定基金和流动资金）的多少，按长期固定（几年不变）的付费率（一般年率为 6%）每月如期将一部分利润交纳给国家。下余的利润，在交纳固定地租缴款和交付银行利息后，企业即可按“结算利润”提留“经济刺激基金”。企业占用的生产基金越少，交纳“基金付费”就越少，提留“经济刺激基金”就越多，奖金也就越多。这样，苏修国家就象一家大银行，通过贷款控制企业，榨取利息；企业则从国家取得资本，从事生产，获得利润，然后按固定比率交付利息。尽管这不是两个独立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是国家垄断资本内部的关系，但也充分说明了苏修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信贷关系，即国家刺激企业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然后进行利润瓜分的关系。这表明苏修的国家所有制是道道地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

其次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来看。

随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工人阶级又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劳动力又重新成为商品，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也就由原来社会主义的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同志关系变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工人进行压迫、奴役、剥削的对抗性的阶级关系。“新体制”规定：“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管理”，经理对企业负“全部责任”，经理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的财产；有权自行确定“编制”，自行“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自行“奖励”和“惩罚”工人，降低工人工资，剥夺工人奖金，开除工人出厂，以至把工人送交法西斯专政机关进行惩处。总之，经理是苏修委派在企业中的全权统治者。苏修一经理直认不讳：“托拉斯就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一厚颜无耻的供词道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豺狼本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是“为掠夺而管理”，“借管理来掠夺”的。而广大工人则变为毫无权利的雇佣劳动者，遭受残酷的奴役和剥削，他们只能在资产阶级特权分子的监督和指挥下，“遵守劳动纪律和内部规定”，进行“劳动、劳动、再劳动”。

在农业中，集体农庄已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农庄的一切生产、财务和人事大权，统统掌握在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农庄主席手里，他们有权决定生产、销售计划，出租和转让农庄的土地，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买卖生产资料，规定庄员的报酬和奖金，进行变相的雇工剥削，可以任意处罚庄员，直至开除庄员资格。而广大庄员则毫无权利，实质上重新沦为遭受奴役和剥削的新农奴。正如苏联人民指出的：“在我们这里现在是新资本家、新富农统治”。

苏修法律规定的所谓“劳动权”，无非是工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则可依据同一法律，借口所谓“技术不够”、“健康情况不适宜”、“生病四个月以上”等“理由”，任意把工人大批解雇，同时又通过官方劳动市场（“劳动就业局”）从失业队伍中廉价招收一批工人。工人为了不致饿死，不得不出卖自己仅有的劳动力，按照“合同”规定，从事繁重劳动，领取微薄工资，忍受残酷的剥削。苏修大力推广的所谓“裁减人员、增加产量”的“谢基诺经验”，就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以达到既裁减工人又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1967—1970年裁减了职工1039人，总产量增加了11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31.8%，而得到最高额追加工资（25—30%）的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4%，1971年工资开支在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比“试验”前的1966年降低了一半多。可见，“裁减人员”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绝大部分装进了资产阶级特权分子的腰包，广大工人遭受的剥削更加严重了。苏修吹得天花乱坠的“谢基诺经验”，不过是资本主义血汗工资制的翻版，其“秘密”在于，拼命提高在职工人的劳动强度，用尽量少的工资榨取尽量多的剩余价值，同时把大批“多余”的工人踢出工厂，扩大了失业队伍。据苏修报刊透露，至1973年7月，仅俄罗斯联邦292个进行“试验”的企业，就裁减了70000人。现在苏联每年有1000多万工人被迫离职，形成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这是劳动力重新成为商品的必然产物。事实说明，在苏修的国营企业中，工人已经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而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同广大工人的关系，完全是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还表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上面。苏修为了适应“经济刺激”的要求，改变了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制，代之以“企业之间的直接经济联系”，把原来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样就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加速阶级分化。而且，各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尔虞我诈，违约成风，造成产、供、销之间严重脱节，这表明，苏修企业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

第三，从分配关系来看。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在苏联，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和人们在生产中的互相关系的蜕变，“按劳分配”也就变为苏修掩盖其按资本和权力分配产品的金字招牌了。他们不断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全面复辟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

“物质刺激”是苏修收买少数工人贵族，腐蚀广大工人的灵魂，加强劳动强度，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苏修无耻地叫嚷：钱是他们强迫工人“好好工作”的“有效手段”。实行“物质刺激”的结果，使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越来越严重。在阿克萨伊斯克塑料厂，工人每得到1卢布奖金，就要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多生产16.6卢布的剩余价值。据苏修公布的材料，从1960年到1972年，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掠取的剩余价值增加了163.7%。

高工资是资产阶级特权分子侵吞和瓜分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分子的薪金，比普通工人的工资高出几十倍以至上百倍。现在苏联工人平均工资每月为130卢布，低的只60—70卢布，60%以上的工人是拿最低工资或接近最低工资。一般企业经理、厂长、工程师的薪金为1000卢布左右，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名义”薪金最多的达6000卢布。在农村，一般庄员的工资每月为30—50卢布，而农庄主席的薪金一般每月500卢布，有的高达1000卢布，高低相差十几倍到几十倍。

高奖金是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地侵占苏联人民劳动果实的另一种形式。苏修

的“奖励”制度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他们大力推广的一种，是所谓“收入取决于最终成果”的“奖励制”。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分红制”的翻版。所谓“最终成果”，指的是利润的多少。利润越多，奖金越多。奖金的分配大权掌握在经理手里，因而绝大部分被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掠走了。据苏修报刊透露，1966年首批改行“新体制”的企业，从利润中提留的日常奖金，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得81.9%，而工人只得18.1%。1969年全国改行“新体制”的企业，各类人员所得的利润提成奖金占本人工资的比重，工人只有4%，工程技术人员占21%，而企业领导人则高达40%以上，有的甚至高出一倍到两倍。戈米尔玻璃厂管理人员的奖金为他们工资的147.2%，然而却没有规定从物质奖励基金中拨出奖给工人的款项。苏联工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新体制的特点在于，工人去完成计划，领导人去领取奖金”。

高工资高奖金只是所谓合法收入，至于不公开的非收入，那就更多了。资产阶级特权分子还别有生财之道，利用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贪污盗窃，化公为私，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大量掠夺苏联人民劳动成果。苏修报刊透露，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了110万卢布，苏乎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贪污受贿获得了数百万卢布。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时指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的积累”。今天的苏联正是这样，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占有大量的商品和货币，发财致富，穷奢极欲；而广大劳动人民则生活日益恶化。据有关材料，苏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工人、农民，高达6900万人，占全苏人口的1/4以上。现在的苏联，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天堂，广大劳动人民的地狱。这对勃列日涅夫之流所谓“消灭了阶级”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由此可见，苏修篡权上台后实行“社会经济改革”的结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完全被改变了，列宁斯大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被搞掉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被瓦解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也被偷换了。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是人剥削人、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关系，是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一切，是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泛滥成灾，是广大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悲惨景象。苏修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苏修的经济基础既然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进一步走向集中和垄断。为了摆脱推行“新体制”所造成的严重窘境，适应扩军备战、争夺霸权的需要，苏修通过“联合制”等手段，加紧国家垄断资本的集中，进一步加强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勃列日涅夫曾露骨地叫嚷：“在使用火箭核武器的武装斗争时”，经济方面必须实行“集中制原则”，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军营”，使“生产和分配高度集中”。苏修头目还宣称：合并企业，建立联合公司，是苏修“社会发展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近几年来，苏修进一步提高国家垄断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程度。现已有6000多个企业被合并到1500多个联合公司中，3%的巨型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在农业中，除通过合并农庄（农庄总数已从1953年的9.33万个减至1971年3.28万个）、建立“庄际联合企业”等手段，加速农业资本的集中外，还大力发展“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跨单位联合组织”（已有5800多个）和“农工综合体”，把农业进一步纳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轨道。可见，苏修所谓“充分发达的……城乡经济体系”，就是进一步加强国家垄断资本对城乡经济生活的绝对统治。就这一点来说，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这倒的确是“充分发达的”。

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

到处发展军国主义。”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充分发达”，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内日益加强法西斯统治，对外疯狂扩张侵略，这就决定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拼命发展军国主义，不断扩军备战，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勃列日涅夫公然叫嚣：“国防问题处于我们一切工作的首位”，大力发展军事生产是苏修“经济政策的不变原则”，“大量的资金要用于国防”。据各方面的材料，苏修军费开支已从1965年的400亿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000亿美元左右，占同期国民收入的比重则从16%上升到20%左右。这一比重大体相当于希特勒德国1936年的水平（19%）。现在，苏修60%的工业企业和80%的科研费用服务于军事目的。他们的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翻版，是极端腐朽反动的军事国垄断资本主义。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列宁这个光辉论断，完全适用于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加强，特别是经济军事化的恶性发展，使苏修城乡经济百孔万疮，日益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败境地。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1970—1973年仅为1950—1953年的47%。农业衰退更为严重，一再减产，不得不靠大量进口粮食过日子。苏修1972年进口粮食1550万吨，1973年进口2390万吨，两年共计3940万吨，创造了苏修进口粮食的历史记录。继去年大量进口粮食之后，今年已向美国、加拿大等国订购了1000万吨。伴随着工农业严重衰退而来的，是财源枯竭，债台高筑。苏修不仅内债累累，还向西方乞讨贷款。截至1973年，苏修已向西方借款80亿美元，无怪乎西方记者讽刺勃列日涅夫之流为“打扮成军事巨人的经济上的叫化子”了。

社会帝国主义经济高度垄断的结果，还“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企业头子为了追逐利润，捞取奖金，在尽量压低工人工资的同时，又大量使用手工劳动。《共产党人》杂志供认：“劳动力的相对廉价阻碍了技术进步，因为从改进赢利率指标的观点来看，使用手工劳动比使用代替手工业劳动的机器更合算”。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加强集中和垄断，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即令在生产技术方面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手工劳动多，至今在苏联工业中手工业劳动仍占一半以上，在农业中占78%；二是把新技术视为“灾难”，全国技术发明的应用率从1963年的41%下降到1970年的20.5%，而1973年化学和石油机器制造部发明的新技术只采用了12%；三是设备陈旧落后，1971年全国金属切削机床的34%，是早已过时的老产品，黑色冶金工业中有1/5以上的延压设备还是沙皇时代的宝贝！这就是“充分发达的，技术装备良好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真相。

在苏修国家垄断资本的残酷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新沙皇把苏联重新变为“各族人民的监狱”，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越来越激化，工人阶级反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各族人民反抗新沙皇统治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今天的苏联，是一座行将爆发的火山。什么“经济改革”，什么“新体制”，都只能加速社会帝国主义的灭亡。

综上所述，勃列日涅夫所兜售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他们极力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冒充为社会主义、把修正主义谬论冒充为马列主义的反动企图，正是他们背叛马列主义、背叛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叛徒嘴脸的又一次大暴露。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等待着苏修“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是这种结局。